

隔空“会饮”说文学

张柠

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编辑约稿,让我谈谈与“文学批评”或者“文学创作”相关的问题。这么大的话题,两种文学活动的思维方式又是反的,我一时不知从何谈起。原本有机会去上海参加《文学报》打算举办的一项活动,大家可以面对面把酒言欢聊文学,无奈活动因“新冠”疫情而改换形式,我也就只能跟他们隔空“会饮”了。

手边正翻阅柏拉图的《会饮篇》,这是朱光潜先生翻译的《文艺对话集》中我最喜欢的一篇,被列入文艺理论必读经典之一。我把它当一个情景剧的剧本来读,其中的台词,既包含了文学创作(无中生有),也有不少的文学批评(化有为无)。正翻到苏格拉底的“老师”第俄提玛出场的那个章节。苏格拉底说,具有真知卓见的第俄提玛,预知将有瘟疫发生,就劝雅典人去祭神禳疫,于是便把那次瘟疫延迟了十年。我差一点惊呼起来,第俄提玛,伟大的女巫啊,你还在吗?为什么不出现在我们身边呢?不过,这一次“会饮”,第俄提玛不是以女巫的身份出场,而是以爱情哲学先知的身份出场,而且又是通过苏格拉底之口间接出场的。她所说的话都查无对证,只能暂时算在苏格拉底名下。

柏拉图《会饮篇》记载的那次聚会,谈论的主题自然不是瘟疫,而是文艺,以及相应的爱情哲学问题。但古希腊的诗人和哲人不是教授,不会上来就讨论文艺理论或者哲学范畴,而是从身边的现实生活聊起:嘉宾的衣着、长相、脾气、习惯、嗜好,等等。他们谈笑风生、相互挑衅、眉来眼去、醋意盎然,场面生动活泼,接着便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要讨论的话题。正因为如此,“会饮”依然是正题,讨论问题不过是“会饮”中诸多项目的一种,于是保全了“会饮”的清誉,没有把“会饮”搞成呆傻型“研讨会”。

换个角度看,这一次古希腊先哲们聚会引出的话题,尽管不是瘟疫,却也说得上是另一种“瘟疫”——爱情。因为爱情跟“病毒”有相似性,它也会在生物活细胞中复制、繁衍、增殖,也会在人与人之间流行传染,而且爱情首选的传播渠道,不是鼻子(气息),也不是舌头(味道),而是眼睛(光波),乃至通过心灵感应传递。跟爱情相伴随的征候,是歌唱、舞蹈、诉说、哭泣,或者沉默。所以,爱情这种从古至今伴随着人类宿主的心灵“病毒”,困扰着苏格拉底以来的许多人。“会饮”现场也被“爱情”所困扰。

参加聚会的,不算侍从和歌女,会饮嘉宾七八个,都是男子,哲学家和诗人、诡辩派学者、悲剧和喜剧作家、科学家,都齐了。最知名的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,

还有诗人喜剧家阿里斯托芬。地点是在得了官方文学奖却名不见经传的剧作家阿伽通的家里。备的酒不是酱香型,是兑水的色雷斯烧酒,估计味道好不到哪里去。为了庆贺阿伽通的得奖和粉丝超过三万人,几位老友凑到一起,打算边喝边聊,聊人生,聊爱情,聊文学,聊哲学,有的危襟正坐,有的插科打诨,大家或即兴创作颂诗,或相互挑刺攻讦,心直口快,言无不尽,自由自在,而且还没有伤和气。这才是谈论文学和批评应有的样子啊!

奇怪的是,这次聚餐会饮,诗人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没有迟到,哲学家苏格拉底却迟到了。我的经验是,无论什么聚会,迟到的总是诗人,尤其是天蝎座诗人。学者一般都很守时,尤其是处女座学者,一般都会提前几分钟到十几分钟。苏格拉底这一次参加会饮,自然又迟到了,但时间不算长,估计一两个小时,因为酒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赶到了。苏格拉底迟到最长时间的一次,是二十四个小时,因一个思想难题没有解决,一天一夜站在路边发呆,不敢乱动,生怕思想会流产。脑子把双脚锁住了,脑子通了,双脚也就动了,他这才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苏格拉底特别善于提问,是思想史上著名的“提问之王”。他经常佯装无知地向对手请教,提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,接二连三地问上几问,就把对手问死了。这把全雅典的人都惹怒了,恨不得将他处死。这一次“会饮”他要把谁问死呢?由于头一天的酒还没醒,大家决定不再闹酒,喝不喝,喝多喝少,都不勉强。苏格拉底很能喝酒,但他从来都不贪杯,没人见过他喝醉。三斤装的大酒瓶,端起来就一饮而尽,那些喝下去的酒,都变成了智慧和词汇,源源不断地从嘴巴里冒出来。苏格拉底是个慢性子,或者说他有很好的节制力,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,总体风格比较沉稳。他喜欢让别人先说,等那些人的蠢话说得差不多了再开口。他不开口则已,一开口就要把前面的蠢话全部清零。这是一种“斩草除根式”的批评。

在“会饮”现场,讨论爱情及其哲学和美学的话题,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,但斐德若却出了个馊主意,要求每个人都做一首颂诗,来歌颂伟大“爱神”的丰功伟绩,跟歌颂宙斯和波塞冬一样。讨论爱情的美学和哲学问题,需要智慧和才能。“歌颂”则不然,只需要修辞术和激情,比如排比、比喻、虚词、呼语。这无疑有很大的盲目性,甚至是对智慧的亵渎。苏格拉底一听就犯了愁。他说,我不知道“爱神”,我只知道“爱情”。他的言下之意是说,你们为什么不讨论“爱情哲

学和美学”,却要去对“爱神”大唱赞歌,我有言在先,这个我可不会!

苏格拉底本来想退场,但转念一想,看看这些蠢家伙到底怎么唱颂歌,于是便决定引蛇出洞,提议让斐德若先来。喜欢玩修辞术的、思想又浅薄的诡辩学派的粉丝斐德若,果然上了钩。他一出场,就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形容词,往“爱神”身上堆:伟大的、光荣的、神奇的、古老的、最高的、勇敢的,等等。他又害怕别人不信,便不断地援引弹唱歌手荷马、诗人赫西俄德、哲学家巴门尼德等人的话来助威,大家依然不信。

另一位诡辩派学者,思维水平略高于斐德若的泡赛尼阿斯,认为斐德若的颂诗观念有问题,他说斐德若把“爱神”绝对化,而忽略了爱情的不同类型。爱情的类型包括:天上的/人间的,高尚的/凡俗的,心灵的/肉体的,美的/丑的。要歌颂的应该是前者,而不是后者,后者那种类型的凡俗爱情只是限于“下等人”。斐德若的确没有仔细甄别对象,更谈不上分类,而是直奔他想象中的高大上的“爱神”,思维简陋、言辞粗浅。泡赛尼阿斯分类之后,并没有批评凡俗的爱情,也还是在歌颂高大上的“爱神”,拐了个弯跟斐德若汇合了。此外,泡赛尼阿斯跟阿伽通的恋情,属于哪一种类型呢?果然,泡赛尼阿斯就开始论证男子之间的爱,要高于男女之间的爱,更接近高尚的、心灵的、天上的、美的类型。他还有一个观点,认为不管哪种类型的爱,如果形式很丑,那也等于零,形式美的爱才值得歌颂,雅典“男风”形式就比其他城邦“男风”形式要美一些。这位诡辩派学者的逻辑也够严谨!而且他废话很多,篇幅仅次于苏格拉底。越是不自信的人,越喜欢多说,妄想用数量来抵消质量的缺陷。

科学家讨论问题有其特点。首先是对现象敏感,其次是善于发现规律。医生厄里什马克就是这样,通过对现象的观察,进而在物质和精神、爱情和文艺之间找到了关联性。厄里什马克同意泡赛尼阿斯的二分法,但不同意他的二元对立观念。厄里什马克认为,爱情跟人体(疾病健康)、气候(冷热干燥)、祭祀(凶吉逆顺)一样,都是要让“相反相仇的东西和谐一致”。文艺(诗歌音乐)最终要呈现的,就是那种最高的和谐之美。爱的哲学(爱情现象的科学),就是“在相反的因素中引出相亲相爱”。他的这种发现,也算不上有什么新意,脑子好使些的人,谁没有点朴素唯物论呢?同时代的古中国的老子、古印度“奥义”“顺世”哲学家,不都知道这些吗?不过从厄

几位老友凑到一起,边喝边聊,聊人生,聊爱情,聊文学,聊哲学,有的危襟正坐,有的插科打诨,大家或即兴创作颂诗,或相互挑刺攻讦,心直口快,言无不尽,自由自在,而且还没有伤和气。这才是谈论文学和批评应有的样子啊!



里什马克的叙述中可以看出,他是个心肠软的哲学(科学)家,而不像东方智者那么冷硬。

诗人喜剧家阿里斯托芬,一直想说话,又一直在压抑自己,结果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打嗝。医生让他找一个东西捅一下鼻孔,打一个喷嚏,发出一声巨响,就能中止那种欲言又止、欲说还休的打嗝状态。所以,打嗝不只是食道收缩异常产生的生理性痉挛,也是“发声”和“抑制”意念反常产生的精神性痉挛。中止打嗝的阿里斯托芬说他觉得很奇怪,为什么打个喷嚏才能让身体恢复正常和谐状态呢?说着便要开始发言。我一直在期待看到阿里斯托芬的高论。我对喜剧诗人比对悲剧诗人更感兴趣。我不太喜欢悲剧那种凄凄惨惨掏心窝子的表达方式,而是喜欢喜剧那种高妙明晰又令人忍俊不禁的表达方式。黑格尔就对阿里斯托芬大加赞赏,并认为喜剧是将悲剧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。柏拉图给阿里斯托芬写的墓志铭说:女神想寻求一座不朽的宫殿,在这位喜剧诗人灵府里寻着了。

阿里斯托芬用小说家的方式讨论问题,上来就讲了一个寓言故事。我觉得他的故事很有趣,打算在这里简述一下。阿里斯托芬说,从前的人有三种类型:太阳生的男人、大地生的女人、月亮生的阴阳人(雌雄同体)。这三种类型的人跟今天的人不一样,他们长着两套四肢和两套身体器官:四条腿、两双手、两副面孔、两套生殖系统。他们身强力壮、精力旺盛,还包藏着向天神造反的祸心。宙斯下令惩罚他们,把他们劈成两半,于是,双体男劈成两个男人,双体女劈成两个女人,双体阴阳人劈成一男一女。那些被分离开来的男女,都在寻找自己原来的那一半:男找男,女找女,或者男女相互追寻,只要见到曾经的另一半,就死死抱住不放,试图再度结为一体永不分离。前面两种属于同性爱情,后面一种是异性爱情。不管哪一种爱情,都是在对曾经有过的圆满状态的寻求。

阿里斯托芬认为,“爱情就是对完整的希冀和追求。”那种曾经有过、后来失去的圆满状态,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、沟通、团结的最原始动力。它就是阴阳合一、天人合一、梵我一如。它就是混沌和太极,就是精神乌托邦。它也是永恒的原型和母题,是诗歌“灵魂回忆”最重要的内容,是叙事作品最终意义的旨归。阿里斯托芬跟厄里什马克的观点是想通的,只不过厄里什马克所说的“和谐”状态接近客观实现,而阿里斯托芬的“完整”状态却像一个缥缈的梦幻。

(下转第7版)